博物館與文化 第 16 期 頁 3~21（2018 年 12 月）
Journal of Museum & Culture 16 : 3~21 (December, 2018)

圍堡、博物館與跨國家族：論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的客家文化特質

黃信洋[1]

The Hakka Fortress, Museum and Transnational Family: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henzhen Hakka Folk Custom Museum

Shin-Yang Huang

關鍵字：客家圍堡、客家博物館、跨國客家家族

Keywords: Hakka Fortress, Hakka Museum, Transnational Hakka Families

---

[1] 本文作者爲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Email: shinnyang2009@gmail.com
（投稿日期：2018 年 7 月 11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8 年 9 月 19 日）

摘要

本文共分成五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會概述中國的客家博物館的發展趨勢，說明客家意識在這些博物館可能引起的改變與效應。第二個部分論述的是客家博物館與跨國客家家族的關聯，說明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結合跨國客家家族與客家博物館的雙重特性。第三個部分說明鶴湖新居乃是羅氏客家家族跨國遷徙的實體化標記，其特色是這個家族的歷史發展跨越了國境內外的侷限，也跨越了種族文化差異的藩籬。第四個部分是鶴湖新居也可以說是大遷徙集體記憶的一種實體化，畢竟，諸如土樓、圍龍屋、圍堡等歷史建築，都可說是客家族群的集體記憶的具體呈現，記錄著客家族群的生活文化軌跡。最後一個部分則論述客家博物館作為全球客家族群網絡發展節點的可能性。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composed of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will discuss the developing trends of Hakka museums in China, explicating the role of Hakka consciousness that gave rise to the changes and the effects on these museums. The second part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akka Museum and transnational Hakka families, indicating that the Shenzhen Hakka Folk Museum combines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national Hakka families and a Hakka museum. The third part shows that the Crane Lake New Residence is the substantiate materialization of th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f a Hakka famil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is family's transnational and transracial development. The fourth part attempts to indicate that Crane Lake New Residence also substantiate for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five migrations of the Hakka people. After all,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including the Fujian Tulou, the Hakka Round House, and the Hakka Fortress, with their records of Hakka life trajectory, could be accounted as material presences of the Hakka collective memory. The final part will end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Hakka museums as a node for developing global Hakka ethnic networks.

一、前言：中國的客家博物館的發展趨勢

按客家研究宗師羅香林（1992：1）的詮釋性說法，「客家」兩字的意思乃是「以客為家」，那麼，客家族群基本上就是一個不斷處於遷移狀態的族群，因此緣故，我們可以看到，客家族群不斷跨越國境內外的地理邊界，往全球各地四散而去。不同於閩南、廣府、海南與潮州等以地名組構出來的族群，以語言作為組構原則的客家族群，基本上就是一個以「文化」（語言）作為族群號召的特殊群體。以文化作為族群集結的重點，某種程度上，似乎也就意味著客家族群對於「原鄉」的想像，比較不會侷限於「閩南、廣府、海南與潮州」等具體地點的地理疆域，客籍移民就會有比較容易有落地生根、創造新故鄉的可能性，於是乎，客家族群最終會形塑出一個遍布五大洲，人數超過八千萬的龐大族群（黃信洋，2017）。

就中國客家博物館的發展歷程來說，誠如表 1 所列，中國大陸目前共有 20 個客家博物館，迅速發展的時間是在 2010 年代之後。如表 1 所示，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乃是第一個以客家文化為首要主題的博物館，伴隨著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在贛閩粵地區的接連辦理，以及世界客屬石壁祭祖大典與世界客屬公祭客家母親河大典等全球客家族群活動的年度性舉辦，諸如此類的全球性客家活動引發的客家意識，也讓傳統客家區域的客家博物館有了蓬勃的發展。不過，2009 年經中國國務院核准冠名「中國」的廣東中國客家博物館，實質上並非國家級的一級博物館，因此緣故，中國尚未出現國家級的客家博物館。放眼全球各地的客家博物館，唯有臺灣的臺灣客家文化館與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是從國家級的角度來設立與維運的。

表 1　中國客家主題博物館列表（製表／黃信洋，2018a：96）

編號	成立時間	性質	公/私營	名稱
1	1996	文物館	公營	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
2	2003	文物館	公營	四川客家博物館
3	2006	文物館	私營	河源萬綠湖客家風情館
4	2007	文物館	公營	廣西賀州蓮塘客家生態博物館
5	2007	文物館	私營	鄧培元客家博物館
6	2008	文物館	公營	贛州客家民俗博物館
7	2009	文物館	公營	中國客家博物館
8	2010	文物館	公營	江西客家博物院
9	2010	文物館	公營	海峽兩岸客家藝術館
10	2012	文物館	公營	三明市客家博物館
11	2012	文物館	公營	汀州客家博物館
12	2012	文物館	私營	鴻志中基客家文化博物館
13	2012	文物館	私營	西部客家博物館
14	2012	文物館	私營	客家紅博物館
15	2013	文物館	公營	世界客僑移民展覽館
16	2015	文物館	公營	梅州市客僑博物館（原「梅州市僑批檔案館」）
17	2015	文物館	公營	龍岩市客家祖地博物館
18	2015	文物館	公營	上杭客家族譜博物館
19	2016	文物館	公營	連城客家民俗陳列館
20	2016	文物館	公營	福建土樓文化博物館

前已提及，客家族群是以「語言」此一文化表徵作為族群聯結的主軸宣稱，而文化的特性就是無法用國界或縣市疆界來明確予以劃定。若說客家族群乃是一個不斷遷徙的世界性族群，「流動」與「定著」兩種狀態也就會同步出現，這也體現在「客」（流動）與「家」（定著）的意涵上面。也因為此種不斷遷徙的族群特色，遷徙過程中遺留下來的具體文化象徵，例如說土樓、圍龍屋、圍堡以及會館等大小規模不一的建築，就是客家族群遷徙過程中遺留下來的各種有形文化遺跡，而這些文化遺跡其實就是客家族群在世界各處發展與落地生根的具體文化例證。

博物館學者王嵩山（2012：173）認為文化物件是開啟記憶與歷史的通

路，因此博物館應該扮演文化發展的催化劑角色（王嵩山，2012：156），而地方的博物館則應該推動地方歷史與生活方式的文化展示（王嵩山，2012：160）。作為一個族群或地方博物館，客家博物館具有類似土樓、圍堡或會館的外部文化展示結構，不過，雖然土樓、圍堡或會館可能也有展示或收藏，客家博物館卻還有研究與教育的能量，能夠對在地文化社群產生較深刻的社會影響，甚至可以引導在地族群的文化發展與社會演化。是故，從工具性的角度來說，相對於土樓、圍堡或會館，客家博物館能夠發揮更有主題性的社會影響力。

二、客家博物館與跨國客家家族的關聯

中國廣東省的中國客家博物館，曾以「世界客家人的精神家園」（郭新志，2014）來自我定位，意圖將自身定位成全球最具規模且可以引領全球客家族群心靈走向的世界客家博物館。然而，容或位於「世界客都」梅州市的中國客家博物館確實在地理上有其影響力十足的重要地位，不過，以何種方式來將自身打造成全球客家族群的「精神家園」，則需要實質上更有效的作法。基本上，由於中國的客家博物館並無法完全落實博物館的四大基本要素，亦即蒐藏、研究、展示與教育，特別是學術研究能量的不足，因此自我期許要成為全球客家人精神家園的想像，仍是必須依託在「世界客都」的符號影響力之下。

於此，中國於 1996 年最早出現的客家主題博物館，亦即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座落於深圳著名的客家圍堡「鶴湖新居」之內，雖然它只是一個街道級的客家博物館，卻實質上出現了一個處於發展狀態的跨國客家格局，也讓這個佔地約莫 25,000 平方公尺的客家圍堡的重要性顯得異常重要。

2012 年，美籍牙買加裔的黑人 Paula（中文名羅笑娜）來到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的所在地鶴湖新居進行跨國尋親，想要尋找她的外祖父羅定朝 (Samul Lowe)，一個羅氏家族的跨國客家文化故事就這樣串聯了起來。由於

鶴湖新居同時具有客家博物館的身分，跨國客家家族與客家博物館的雙重特性就這樣聯繫了起來，也讓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體現出了一種活生生且跨越種族與國界的客家文化特性。而這個跨國客家家族的故事仍舊在客家博物館的架構之下延續著，未來這個客家家族的跨國文化版圖應該會有更多元的發展性，畢竟，除了西印度群島之外，羅氏家族的遷徙地點還包括有東南亞的部分在內。

圖 1　鶴湖新居正面照（攝影／鄧雲棟）

位於鶴湖新居這個巨型圍堡之內的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本身的外觀結構就可以說是一種大型的客家文化展示（參見圖 1）。放眼中國大陸的客家區域，土樓、圍龍屋、圍堡與客家會館，都是能夠具體展現客家文化的歷史建築文化遺產。這個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鶴湖新居與羅氏家族三位一體的圍居建築，就是博物館、圍堡與家族史彼此交織的體現，在中

國乃至全球的客家博物館之中，可說是獨樹一格，具有鮮明的獨特性。[2]

綜觀各式圍居的基本結構，體現出來的是一種防禦性格濃厚的建築格局，從山賊到海盜，都是防範的對象。[3]就圍居的格局來說，屋子的中心點通常是祖堂與書房的所在地，象徵的是權力的核心，也意味著科舉功名的精神乃是其首要看重的事。法國當代思想家傅柯曾用「全景敞視監獄」的例子來說明權力的運作方式，亦即圓形監獄的中心有一個監視塔會隨時監視犯人的一舉一動，而由於中心塔的位置無法辨識裡面是否確實有人在監視，久而久之，犯人遂有自我監控的狀況出現，中心化的權力便轉變成去中心化的自我監控權力運作方式（劉北成、楊嬰遠譯，1992）。此外，全景敞視主義除了監視的功能，還是一個對人進行分門別類及空間重組的場合，可以對人進行實驗分析，對人進行改造，亦可以進行自我監督（劉北成、楊嬰遠譯，1992）。同理，原本是出於防禦因素而建構出來的各式客家圍居[4]，彰顯出來的宗族家父長式集中化權力，在外敵四起的時代當然有其集中心力團結對外的特質，可以對其內居民進行軍隊式改造，而隨著國家社會局勢穩定且自由社會對於個人隱私的強調，此種中心化權力監控意涵強烈的大型建築，迫使內部居住者開始向外遷移，從而也讓圍屋漸漸出現人口悉數外移而的現象。

由原本防禦外部敵人的內聚力強的圍居建築，一直到權力過於集中而出現向外推移的狀況，團結的建築象徵反而成為促使居民向外離散的驅力，讓越來越多圍居漸漸變成人煙稀少的荒蕪住所。總體狀況雖然如此，不同類型的圍居其實還是有不同的建築特性。例如說，深圳的諸多客家圍居由於多數

---

[2] 「最富地方特色和典型意義的是那種帶碉樓的方形城堡式圍樓。如羅瑞合村的羅氏鶴湖新居，佔地面積 24819 平方米，建築面積 14530 平方米，平面呈回字型，裡外有八個碉樓、二個望樓，號稱『九廳十八井、十閣走馬樓』。其建築規模之宏大，氣勢之磅礴，據目前所知，堪稱閩粵贛客家圍樓之最。這種類型的客家城堡式民居，建築面積在 5000 至 1 萬平方米以上的亦爲數不少」（楊耀林、黃崇岳，2001：32）。

[3] 「客家圍堡，包括閩西土樓在內，是客家人由於處於不穩定的社會環境下，謂求安全而產生的，是生存競爭的需要」（吳念民，2016：76）。

[4] 本處使用「圍居」而非常見的「圍屋」，主要是因爲「圍屋」指的是獨棟式的建築，「圍居」則包括圍屋、堂橫屋、圍龍屋、圍堡與圍村等多型態的複合式建築。

是在遷海復界後出現，對於個人隱私的考量就明顯高於傳統土樓，裡面會出現許多家庭式的私人化隔間，明顯是對於家族隱私的更為看重。[5]6此外，深圳圍居具備堡壘一般的宏觀特性，遂被在地客研究人員用「圍堡」來稱之（劉麗川，2002），而這些圍堡內部的許多具有文化典故的雕刻裝飾，既彰顯出這些客家家族的相對富有狀態，也顯示出圍堡定居的客家族群已經不再恪守士農工商的位階差異，而是讀書與經商皆有其重要性，不能刻意分出先後（張衛東，2014a：6）。

圍屋的中心化權力結構，體現出客家族群某種「被圍住又想突圍的心態」[7]，也體現出了客家族群既保守又勇於開拓的特質。一般來說，客家族群的離鄉到海外發展，有的原因是家鄉謀生不易，有的人是想要出洋尋求自我實現的機會。由於羅氏家族較為富裕，有「公嘗田」的收益用於家族開銷，所以羅氏家族成員往海外發展通常是自願前往，不會淪於成為「豬仔」或「契約華工」的地步（羅敏軍，2015：33-34）。而美籍牙買加裔的黑人 Paula 跨海找尋的祖父羅定朝，就是在此背景下前往位於加勒比海的牙買加開始鄉間小雜貨店的經營工作。他由鄉間的零售經營、小批發，發展到成為牙買加首都金斯敦的中大型批發產業的過程，也呼應了當時華人客家族群幾乎壟斷該地零售業，將零售業發展成客家族群產業的歷史。[8][9]

---

[5] 「深圳圍堡在處理大家族與小家庭的關係上，也有自己創新的設計。閩西土樓、粵北圍龍屋和贛南土圍子中，小家庭的生活空間由若干獨立的房間組成，深圳大學建築系副教授朱繼毅說：『就像個大集體宿舍』，此話生動形象地道出了這種房間佈置的本質。因爲在這些建築中爲了家庭空間的完整統一，爲了防衛的需要，『小家服從大家』是最基本的原則。而且，爲分配房間的『合理』，同一家庭的房間甚至分佈在不相鄰的位置，只能通過公共走廊或巷道相聯繫。而深圳圍堡內在上、下天街及左右縱向天井的內外側佈置的都是自成系統的生活單元，單元內有獨立的天井、堂屋、臥室、廚房、水房，有的還有門廊、照壁。比起『集體宿舍』這種設計理念來，表達的是更便於家庭生活和照顧到小家庭私密的『家庭意象』」（劉麗川，2002：69）。

[6] 「深港客家圍樓內的住房，無論是四周圍樓或中間的堂橫屋，都是連在一起的『斗廊式』單元房，即以一廳、二房、一天井、二廊爲一户的標準單元。而廳和房都有木樓棚（即兩層），單獨有樓梯上下，故顯出前低後高。這種集居住、會客、儲藏和廚房於一個單元之中的住房，生活上比興梅地區圍龍屋中的單間組合更爲方便」（楊耀林、黃崇岳，2001：34）。

[7] 「圍屋（圍堡）的最主要的就是一個『圍』字。『圍』，不單是客家人的居住特徵，其實也是心理特徵」（吳念民，2016：78）。

[8] 牙買加零售業成爲客家族群產業的重要原因是：「客家族群、華人社團和族群資源，成爲客家零售業生產要素的重要來源與補充。源源不斷的族群移民，讓客家零售業獲得了充裕和穩定的勞動力；在社會壓力催生下的華人社團（如中華會館、致公堂等）在幫助華人解決內部糾紛、對外協

三、客家族群跨國遷徙的實體化標記

與客家研究宗師羅香林同宗族，定居於鶴湖新居的羅氏家族，原是廣東梅州市興寧縣移居至此的客家人。而鶴湖新居這座圍堡，既是羅氏家族延續客家文化的城堡，亦是以羅氏的家族史文化展示為主軸的客家博物館，其特色是這個家族的歷史發展跨越了國境內外的侷限，也跨越了種族文化差異的藩籬，而此家族離散四方又聚合於此的族群歷史，時至今日仍舊在發展中，呼應了羅香林提出的客家族群遷徙說的脈絡，由贛閩粵邊區遷往深圳地區（第四次大遷徙），再由深圳龍崗地區移往海外的加勒比海地區（第五次大遷徙）。

西元 1655 年，為了防備紮營臺灣的鄭成功的隔海突襲，清廷頒布了禁海令，阻絕中國移民進入臺灣的機會。1661 年，清廷頒布了遷界令，要求沿海居民向內搬遷 50 里（1664 年更要求再往內搬遷 30 里），直到鄭氏家族的臣服，清廷遂於 1684 年解除禁海令（劉麗川，2002）。由於這些沿海地段荒無人煙且百廢待舉，而傳統客家人居住的山區卻又無法撫育數量持續增多的客家人口，眾多客家族群遂藉著這個禁海令解除，清廷鼓吹遷海復界的機會，走向了沿海的深圳區域，正是在此一背景之下，鶴湖新居的奠基人羅瑞鳳，由梅州的興寧遷徙到深圳市的龍崗，從羅香林五次遷徙論的角度來說，

調與資金借貸的同時，還制訂了許多有利於客家零售業的商務邏輯。如傭工培訓制度：凡到牙買加的華人新移民，在獨立開辦零售店之前，須在親朋戚友的店舖內傭工 2-3 年；在初步掌握經營技能後，經由店主推薦給批發行建立信用關係才能開始創業」（羅敏軍，2016：487-488）。

[9] 李安山（2005：45）的說法是：「爲什麼華人能夠在牙買加的零售業中獲得成功呢?我們可以將他們的成功歸之於四個因素：機遇、品質和服務、社會網路以及有利的政策。第一，華人開始經營零售業的時候正值當地存在一個急需填充的經濟空間。當他們到達牙買加的時候，在零售部門的競爭並不激烈。來自非洲的奴隸剛剛獲得解放，還沒有發展出必需的商業技巧，而其他種族集團則認爲開商店有損他們的身份。第二，華人享有節儉和勤勞的美譽，而且他們注意在商業入門方面對孩子進行實踐教育。此外，他們還提供了比其他商人更好的服務，這說明他們建立和擴展了自己的生意。第三，他們所建立的社會網路有兩個重要的功能。他們提供了一個充裕的和有效的勞動力後備軍隊伍，這些勞動力大部分是他們在中國的親戚，可以在農村商店裡從事長時間的工作卻只要求低工資。此外，在批發業和零售業的華僑中存在的聯繫便利了他們的經濟擴展。最後，殖民政策在他們的成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在大環境中沒有有利的政策，華人就不會取得同樣的進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華僑若是爲了進行商業活動的話，他們移居牙買加便沒有任何限制。這一政策吸引了有經驗的華商到牙買加來開創自己的事業。」

這一次的遷徙呼應的是客家族群的第四次遷徙的歷史。[10]

羅瑞鳳創建的鶴湖新居，見證了羅氏家族在龍崗地區的經濟發展成就，然而，前述牙買加裔親人千里追尋的外祖父羅定朝，卻是由於外在環境鴉片禍國且羅氏家族景況不再的背景下，其外祖父決定動身走向世界，前往牙買加探尋新的可能性。於此，我們不僅清楚看見客家族群的流動軌跡，此種軌跡一方面是客家文化由原鄉向海外擴張的歷史例證，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客家族群願意向外開拓並融入在地文化的族群特質。

鶴湖新居門口的「聚族於斯」等四個字，意味著這個圍堡乃是羅氏家族世居的住所，也指出了客家族群對於宗族的看重。[11]如同臺灣曾經出現的閩客械鬥的族群鬥爭事件，清朝時候廣東西路亦曾出現廣府與客家的大規模族群械鬥。不過，在廣東西路發生族群械鬥之時，位於廣東東路的深圳客家區域，廣府與客家等兩大族群卻不曾出現大規模紛爭（張衛東，2014b），這也指出了廣東東路深圳客家的族群特質，例如說，深圳圍堡不僅更注重隱私性與文化氛圍，對於商業的接受度也大為提高，擺脫了客家族群傳統依循的士農工商位階的儒家精神。於此，對於士農工商的同步看重，經濟的發展以及文化涵養的提升，可能是深圳客家能與其他族群穩健相處的前提因素（張衛東，2014a：3）。而鶴湖新居集結閩、贛、粵客家圍居的要素，融合許多廣府客家建築的元素，也顯示出深圳客家族群對於廣府族群文化的接納與認可。[12]

---

[10] 第四次的客家族群遷徙主要由四個部分組成：一、「湖廣填四川」，二、「遷海復界」，三、「赴臺灣」，四、「下南洋」（劉麗川，2002：69）。

[11] 相較於深圳客家圍堡的宗族化聚居現象，閩西的土樓則比較呈現開放性的客家族群聚居狀態：「土樓裡的聚居，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並不是『聚族而居』。大部分的土樓也主要不是家族建築，而更像是合股居住的『集合住宅』。除了土樓內空間所表現出來的均等性及向心性，與一般家族建築的空間等級分佈有異之外，更重要的是，土樓的結構形式本身與分家之間存在著固有的矛盾，導致了它難以適應聚族而居的需要」（鄭靜，2014：138）。

[12] 「鶴湖新居是深港地區城堡式圍樓的典型代表，集閩、贛、粵客家圍屋的精華，綜合了粵東北地區堂橫屋、圍龍屋和四角樓的要素，並雜糅許多廣府建築元素，體現了客家文化與廣府文化的交融，是深港地區客家人智慧的結晶」（深圳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編，2012：72）。

博物館結合了圍堡，又結合了羅氏家族這個跨國客家家族，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因此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客家文化博物館，因為羅氏家族的跨國遷徙故事還在持續發展中。這個尚有宗親祭拜的博物館，也是羅氏家族浪跡海外的客家博物館，實質上體現了跨國客家博物館的內涵。在全球客家族群網絡不斷擴張與細緻化的今日，客家族群「離而不散」的特性讓這個族群網絡漸漸往全球的格局進行擴張（黃信洋，2017）。循此，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展示的不僅是家族史、客家史、圍堡史，更是客家族群跨國流動的一個個案史。如今，鶴湖新居乃是深圳眾多圍堡中比較幸運的一個，因為大部分的深圳客家圍堡都是處於漸漸消頹有待發展的狀態。如何有效活化這些客家文化的歷史遺產，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應該是一個值得借鑑的例子。

就圍堡內部的無形文化資產來說，今日風行於當代臺灣社會的「小農經濟」、「友善農耕」或「合作經濟」等概念，其實一直都是客家圍居內部的生活特性。[13]傳統客家族群的生活智慧一直都存在著（圖 2 的製糖機就是羅氏宗族合作經濟、共享經濟的一個例子），而以博物館的角度來保存之，乃是因為希望這些傳統客家的族群智慧能夠有新的延續方式。

[13] 「每個客家大圍屋，都是完整的自給自足的生產和生活體系。各家擁有自己的土地和生產工具，而大牲口和大農具在圍屋內部可以互相租借。大門口有共同的曬穀的禾坪和養魚的池塘。圍屋內還有共同使用的水井，有可以互相使用的穀物加工工具——風車、磨、碓、磨等，甚至還有榨油和榨糖的大型工具。有些圍屋內還建有學校（私塾），圍內或圍屋旁邊建有廁所、豬圈」（楊耀林、黃崇岳，2001：13）。

圖 2　鶴湖新居內的牛拉石轆（甘蔗榨糖機）側影（攝影／鄧雲棟）

四、具象化的大遷徙集體記憶

高木桂藏（關屋牧譯，1992）認為客家族群乃是東方的猶太人，因為客家族群一樣經歷著全球離散的命運，在政治經濟層面都一樣有令人佩服的表現。不只如此，這兩個族群也都有在母國之外經歷過被汙名化與政治性的迫害。[14]從福建土樓於 2008 年獲選為世界文化遺產開始，不同類型的客家圍居建築就漸次獲得了關注，諸如土樓、圍龍屋、圍堡等歷史建築，都可說是客家族群的集體記憶的具體呈現，記錄著客家族群的生活文化軌跡。而此種國際性的文化遺產價值的認可，對客家文化具有正面詮釋的意涵。

[14] 招致迫害的可能原因是：「中國離散社群和猶太離散社群的確有一些足以招致憤恨的特徵，如外貌舉止怪異、拉幫結派、精於算計、不安分守己，尤其是在個別的但非常重要的領域（如零售和本地貿易）取得了本地人難以企及的成功」（周琳譯，2015：159）。

基本上，中國華南地區的族群都有屬於自己的族群起源神話，[15]羅香林建構出來的客家族群五次遷徙史，其背後強調的集體苦難經歷讓這個論述具有了神話一般的力量。祖先們歷經千辛萬苦地遷徙的集體記憶，化成了客家族群邁向世界的內在動力。苦難之所以會具有力量，是因為這個故事不斷以新形式出現並盤旋在客家族群的集體記憶之中，也由於這個苦難故事的轉述者已經安然度過這個苦難，或是可以心平氣和的轉述這個苦難，苦難的經歷或故事就會轉型成具有精神鼓舞力量的神話故事，進而再強化苦難經歷的神聖性格。[16]鶴湖新居體現的是客家族群流動狀態的發展過程的一個環節，而這個圍堡客家博物館則是展示與蒐藏一個客家家族活生生的遷徙歷史。

就圍居建築大量出現的贛閩粵山區來說，由於這個區域乃是「盜賊」不斷生成的場所，因此就促成了「圍居」此種具有防禦性質的城堡式建築的出現（許懷林，2016：251）。出於防禦與自衛的需要，民間居民就以縣城的城池與衛所為模仿對象，建造出了此種防衛意涵濃厚的圍居建築（許懷林，2016：237）。而當山區的客家族群開始由贛閩粵邊區往濱海的深圳地區移居的時候，出現在深圳的客家圍堡，就記錄了客家族群由「山客」變成「海客」的文化發展歷程，因為圍堡的建築結構本身同時匯聚了源自於山區客庄的四角樓、堂橫屋，以及圍龍屋的建築特色。

隨著客家族群由東江上游移居到東江下游，濱海地區的深圳圍堡也呈現出了此種客家文化的發展歷程。隨著清朝末期國力的疲弱與經濟發展的衰頹，華南地區有越來越多的客家人前往世界各地尋求新的發展機會，於其中，有許多客家人是上船之後才知道自己要前往的國度，更有一些客家人是

---

[15] 「一般地說，珠江三角洲的廣府人稱自己來自粵北南雄珠璣巷，韓江三角洲的福佬（潮州人）稱自己來自閩南莆田，而粵東的客家人則稱自己來自閩西寧化石壁」（楊耀林、黃崇岳，2001：8）。

[16] Halbwachs 的說法是：「在遙遠的世界裡，我們遭受了令我們無法忘懷的苦難，然而，對某些人來說，這個遙遠的世界卻仍然散發著一種不可思議的魅力，這些人歷經磨難，倖存了下來，他們似乎認爲，他們自己最美好的歲月都駐留在那個艱難世界裡，他們希望重溫這段逝去的時光。雖然有些例外，但大多數的人們都或多或少地往往傾向於對過去抱有所謂的懷舊之情，而這就是其原因所在」（華然、郭金華譯，2002：86）。

因為受到「客頭」誘拐、哄騙、利誘、暴力脅持、追逼賭債，甚至以鴉片為誘餌而遠離家鄉（周琳譯，2015：140）。這段經歷就是羅香林客家五次遷徙說的最後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也開啟了客家族群具有跨國甚至全球流動的離散經歷。由於本文論述的焦點是鶴湖新居羅氏家族的跨國生活故事，如下背景文字說明會把重點放在客家族群移往加勒比地區的重點敘述。

在 19 世紀，超過 100 萬名華人以廉價勞動力的形式進入了世界市場（周琳譯，2015：137），此時，中南美洲由於受到非洲奴隸貿易的影響，廣大的種植園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力，因而來自華南地區的華人契約工，就成為種植園填補勞力空缺的來源，也就是當時俗稱的「苦力體系」（周琳譯，2015：81）。而隨著這些華人契約工約滿得以自由選擇職業之時，市場經濟的發展就讓他們有機會往資本門檻較低的零售業尋找出路。[17]

就牙買加的零售業來說，由於華人開設的店鋪大多位於有利的商業地段（如首都金斯敦的華人商業區，且成功地打入批發貿易領域，既從國外進口各種食品，也將國內的特色商品銷往國外，因此華人在零售業可說是獨佔鰲頭（周琳譯，2015：172）。為了理解當地文化並被當地人接受，也因為小成本的零售業總是需要對家庭的勞動力進行自我剝削，要利用家中既有的勞動力，隻身前往牙買加從事零售業工作的男性，總是會急於與當地女性同居或締結姻親關係（周琳譯，2015：176）。[18]正是在此種背景之下，鶴湖新居羅氏家族的羅定朝前往了牙買加進行零售業的工作，在由零售業發展為批發業並經歷產業低潮而歸國之後，美籍牙買加裔的黑人 Paula 的深圳尋親之旅，就讓這個客家家族的跨國聯結故事開展了出來。

---

[17] 「當一個地區由小農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華人商號就會緊隨著商機而來，而且常常都是捷足先登」（周琳譯，2015：29）。

[18] 「許多中國移民從抵達牙買加的那一刻起，就開始努力地理解並接受當地文化。很明顯，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非是喜愛牙買加文化，而是謀生的必須。因爲最初的移民大多是隻身一人的男性，所以他們常常會與本地婦女同居」（周琳譯，2015：176）。

五、結語：客家博物館作爲全球客家族群網絡的發展節點

在歐洲，博物館的外觀若不是宮殿式的造型，就會是希臘神廟的造型，好像博物館的造型應該就要以此為標準(Dana, 2012:21)，而臺灣的首座博物館（日治時期建立的臺灣博物館），就是以這種標準自我看待的博物館，充分顯示出日本人在精神層面努力想要向歐洲人看齊的現象。回到中國的客家博物館的例子，博物館的外觀造型還是會與傳統的客家文化意象有關，如中國客家博物館與西部客家博物館就是以土樓造型為主要意象，其中更有四個客家博物館是以既有的客家傳統圍居或建築作為博物館的館舍：深圳市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以圍堡（鶴湖新居）作為館舍、鄧培元客家博物館是以圍龍屋（濟濟樓）作為館舍、廣西賀州蓮塘客家生態博物館是以圍屋（陳家圍屋）作為館舍，四川客家博物館則是以會館（湖廣會館）作為館舍。基本上，中國的客家博物館都具有鮮明的在地化特色，意味著這些館舍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覺。

關於鄉土建築的建造過程，學者鄭靜（2014：134）曾表示：「鄉土建築沒有固定的圖則，人們在建造每一幢房子的時候會在當地文化、技術、材料的條件約束下選擇大致的建築樣式，爾後根據自己的需要加以調整。」此乃意味著，傳統的圍居鄉土建築，由於沒有明確的興建藍圖，只有大致的建築樣式，因此每個圍居就細節層面來說都有其獨特的一面。職是，在此基礎架構上興建的客家博物館，自然也會有鮮明的特色。若說圍屋、圍龍屋、土樓、堂橫屋與會館乃是客家族群遷徙的實體文化痕跡，那麼，於其上設立的客家博物館（除了上述中國的部分，香港的客家文物館也是設立於傳統客家民居，而近幾年陸續出現在馬來西亞的客家文物館，有許多都是選擇既有的會館來設立）（黃信洋，2018b），由於還能夠發揮展示與教育的功能，對於客家文化的傳遞就能夠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力。目前，全球各地的客家博物館陸續在出現，展現出客家族群對於自身文化的某種自信，因此緣故，除了全球的客家社團正努力的透過跨國客家集會的形式來建構全球客家族群網絡之外（黃信洋，2017），客家博物館的潮流亦有助於此種現象的發展（黃信

洋，2018b），意味著客家博物館可以藉由客家文化的展示與教育來推動一種華人風格的另類文化全球化。

相較於此種另類的文化全球化，羅氏家族成員的前往牙買加發展，就是在華人勞工替補英屬西印度群島奴隸制度廢除的勞力空缺，成為契約勞工的時代脈絡背景之下。李安山（2005：39）據此也論述了契約華工與全球化的關聯：「契約華工既是全球化的產物，又為全球化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正是在此種華工全球流動的背景之下，有眾多牙買加客家人結束契約工作開始從事零售業，於此歷史階段，羅氏家族的羅定朝就動身前往該國，開啟了一段跨國客家家族的故事，而在羅氏後人 Paula 前往深圳尋找外祖父的時候，客家圍堡、客家博物館與跨國客家家族的三合一關係就出現了。羅香林提出了客家族群五次大遷徙的論述，前面三次遷徙由於歷時遙遠只能訴諸於族譜文字記載的虛實，後兩次的遷徙則有各種的客家民居與會館等文化實體可以佐證，而羅氏家族成員的出洋，就是後兩次遷徙的一種個案。時至今日，在臺灣推展「浪漫臺三線」、「靚靚六堆」與「幸福臺九線」等計畫，以及中國在贛南、粵東、閩西等三個傳統客家文化區域設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之後，一種類似生態博物館的文化復興運動正在兩岸開啟，於此，全球客家族群網絡的發展即將進入下一個階段。

參考文獻

王嵩山，2012。博物館蒐藏學：探索物、秩序與意義的新思惟。臺北：原點。

吳念民，2016。客家圍堡與深圳客家人。收於深圳市客家文化研究會編，第七屆客家文化高級論壇暨首屆客家文化創新論壇論文集，頁：74-79。深圳：深圳市客家文化研究會。

李安山，2005。生存、適應與融合：牙買加華人社區的形成與發展（1854-1962），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38-55。

周琳譯，胡其瑜著，2015。何以為家：全球化時期華人的流散與播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客家文化博物館聯盟、河南博物院編，2017。客家文化博物館及相關機構名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張衛東，2014a。論深圳客家文化特色。收於劉麗川編著，深圳客家研究，頁：1-12。深圳：海天。

張衛東，2014b。從《豐湖雜記》到《被遺忘的戰爭》。收於劉麗川編著，深圳客家研究，頁：383-400。深圳：海天。

深圳龍崗客家民俗博物館編，2012。鶴湖新居。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

許懷林，2016。客家社會歷史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郭新志，2014。世界客家人的精神家園：中國客家博物館介紹，全球客家研究，3：381-388。

黃崇岳，2003。南粵客家圍與中原文化，中原文物，3：63-67。

華　然、郭金華譯，Halbwachs, M.著，2002。論集體記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黃信洋，2017。政治先行抑或文化先行——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全球客家族群網絡建構方式之探討。收於張維安主編，在地、南向與全球客家，頁：499-531。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黃信洋，2018a。試論閩西客家博物館的原鄉意象與客家內涵，全球客家研究，11：87-118。

黃信洋，2018b。客家博物館與全球客家族群網絡的擴張與拓展。博物與客家研究。苗栗縣：桂冠。

楊耀林、黃崇岳，2001。南粵客家圍。北京：文物出版社。

劉北成、楊嬰遠譯，Foucault, M.著，199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桂冠。

劉麗川，2002。論深圳客家圍堡的歷史及文化價值，東嶽論叢，23（2）：67-71。

鄭　靜，2014。土樓與人口的流動：清代以來閩西南僑鄉的建築變革，全球客家研究，2：123-164。

羅香林，1992。客家研究導論。臺北：南天。

羅敏軍，2015。祖父的故事。西安：世界圖書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羅敏軍，2016。從契約勞工到零售商人——論惠東寶客家人對牙買加近現代零售商業的歷史貢獻，收於深圳市客家文化研究會編，第七屆客家文化高級論壇暨首屆客家文化創新論壇論文集，頁：479-491。深圳：深圳市客家文化研究會。

關屋牧譯，高木桂藏著，1992。客家：中國內部造成的異鄉人。臺北：關屋牧。

Dana, J. C., 2012. The Gloom of Museum. In: Gail Anderson (Ed.), Reinventing the Museum: The Evolving Conversation on the Paradigm Shift (2nd ed.), pp.17-33.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